

至政治改革，都屬於啟蒙運動的產物。而帝國主義的問題同樣複雜，如包括種族問題、軍事和經濟的考慮等，故我們實難言帝國主義主要源於某些思想，而忽視其他促成帝國主義的因素。而啟蒙運動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取決於對這兩個概念的界定。不然，我們實難以討論兩者的關係。最後，縱使啟蒙運動和帝國主義確有關係，但這一關係是在什麼時候發生呢？為何作者以西藏作例子，以說明其論點？英國在亞洲的軍事擴張（如入侵印度和尼泊爾），遠早於1904年對西藏的入侵，而1839年亦發生了鴉片戰爭，若要證明啟蒙運動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甚至說明這一關係的成立時間，西藏恐怕並非最理想的例子。總結而言，本書的題材吸引讀者，亦能為英國與西藏的交往史提供一些史料上的補充，但讀者恐怕難以從中得到更深入的觀點。

趙敬邦
曼切斯特大學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By
STEPHEN R. PLATT.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xii, 278pp.**

從19世紀中期創建湘軍贏得太平天國戰爭的勝利，到1898年開始湖南省內改良，再到領導20世紀第一次嚴格意義上的反滿起義、1911年辛亥革命和成立中國共產黨，湖南為中國近代化提供了遠多於其他省份的改良者、軍事將領和革命者。這些參與以上政治事件的湖南人如何認識自己的母省及其與外界（外省和外國）的關係？中國近代史上這些為人熟知的事件對於這些人的意義有何不同？是什麼刺激他們行動？誰是湖南青年的行為榜樣？他們對於未來的理想是什麼？一言以蔽之，他們在清末民初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如何賦予這些喧囂的事件對於中國的意義？這些正是作者關心的問題。以往的研究不是把湖南人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歸因於其獨特的精神和個性，就是歸因於湖南多山的地理環境，甚至認為吃辣椒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本書作者認為思想不是抽象的、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具有多種可能性的，由於自身生活引起的特殊關注的推動，讀者往往為了配合自身的需求來解釋文本的內涵，所以對於思想史的理解最好將其還原到當時的語境。在這種方法的指導下，作者認為近代這一系列政治事件具有意識形態上的連續性，而要揭

示這種連續性，可以通過分析近代湖南人師生之間、作家與讀者之間、革命同志之間、同學之間以及父子兄弟之間的私人交情，探悉這些事件的領導者所共有的意識形態傳統。

作者主要從兩個緊密結合的主題來闡發自己的觀點，一是湖南人民族意識的形成，二是19世紀以來湖南知識份子對王夫之「不斷地重新發現」（ongoing rediscovery）。作者所說的湖南人的「民族意識」，指的是在湖南傳播的兩種信念的結合，一是湖南人是一個可辨別的群體，具有有別於其他省份的共同個性特徵，二是湖南人擁有共同的獨特歷史，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歷史責任感，這種歷史責任感認為湖南注定要帶領中國走向未來，或者以本省獨立保全中國的希望。然而從近代中國的主流敘述來看，這種現象是不應該存在的。傳統的觀點認為，近代以來對王朝忠心的儒家思想自然地轉變成對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冀望，並由此推論中國知識份子夢想建立統一的中國。然而，很多20世紀前後湖南重要的改良者和革命者認為，他們效忠的對象主要是他們的母省。關於這個問題，作者主要從湖南人「省」的意識的形成，以及忠於母省的意識與「效忠」王朝的信念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第二個主題與第一個主題相互糾結，互為論證，作者主要探討近代湖南人如何解讀生活於17世紀的湖南明遺民王夫之的思想，從各個時期湖南精英對王夫之思想的理解來闡述「省」的意識的出現與形成，以及他們如何從王夫之的思想因素中找到其與「西方」思想（如進步、民主和民族主義）不同尋常的共同之處。

本書主體分為七章，對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各個歷史階段湖南精英對王夫之的塑造以及「湖南省」認同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

作者從19世紀20年代湖南學者鄧顯鶴尋找明代人編的《楚寶》，並致力編寫《沅湘耆舊集》開始敘述。《楚寶》是自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14世紀湖南重要學者和政治家的傳記集，是一部獨立於省界、國界和王朝界限變動之外的真正的地方史。作者認為《楚寶》最早記載的人物屈原和賈誼，代表了湖南文化的蘊涵和淵藪，而王夫之在兩千年後繼承了這種地方文化的氣質，成為忠君隱士的形象代表。從19世紀30、40年代開始出版王夫之論著的活動，到太平天國時期湘軍將領曾國藩等人主持重印王夫之書稿、郭嵩燾在長沙修建王夫之祠，王夫之作為湖南地方知識份子的祖先和模範逐漸形成，由此郭嵩燾為湖南人樹立了湖南人自己的聖人。作者主要關心的是郭嵩燾對王夫之思想的解讀，作者認為郭嵩燾主要以王夫之著名的《讀通鑑論》和《宋論》為依據，強調建立和恢復社會秩序，與之前唐健和王家後裔對王夫之的

解讀有所不同。這與郭嵩燾作為湘軍高層將領中唯一回湘主持自強改革卻遭受地方士紳反對的現實狀況有關，郭希望利用王夫之的思想來維持湖南的地方秩序，解釋其出使英國的使命及改革的思想淵源。

第三章中，作者探討的是19世紀末陳寶箴領導下的湖南省地方改革時期，譚嗣同等新一代湖南人從王夫之的思想（《讀通鑑論》、《宋論》、《噩夢》、《思問錄》）中尋找到改革、民主以及民族國家意識等因素。譚嗣同三位主要的老師都是郭嵩燾復興王夫之思想的支持者，對譚嗣同影響很大。如同郭嵩燾發現王夫之明亡之後的生活與自己在太平天國戰爭前期的生活的相似，譚嗣同注意到王夫之所面對的衰世，與自身所處的局勢非常雷同，並且認為只有湖南人，才能繼承孔孟至程朱理學再到王夫之這一脈「經世」的學術脈絡。譚嗣同認為王夫之《思問錄》「盡器則道在其中」的核心觀念是制度和政府改革的理論支持，這也成為19世紀末湖南地方改革合理性的思想依據。南學會和時務學堂的創立標誌着湖南省復興改革運動發展到頂點，也代表湖南學者對本省學術和思想傳統的認同和發揚。隨着經濟改革的進行，省的自治思想出現，譚嗣同發現王夫之的著作同時也具有民主的因素，民主並非西方的概念，而是一個只有王夫之完全明白的中國思想傳統，自三代以下只有王夫之發展了「民權」理念。而唐才常將王夫之的《黃書》引入時務學堂課堂上的討論，引起新一代學生的思考，此書所強調的夷夏大防，使時務學堂的學生在思想上與其前輩發生了分歧。反滿意識的形成，讓譚嗣同開始反思對湘軍的評價，他認為以曾國藩和左宗棠為代表的湖南人從來不是中國的救星，相反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壓迫者。新一代的湖南學生開始接受反滿的意識，而這也導致百日維新失敗後參與湖南改革的知識份子被鎮壓的後果。

第四章討論湖南知識份子在組織自立軍發動第一次反滿起義失敗後，在日本東京弘文學院時期的思想發展。自立軍起義的夭折及其犧牲者為湖南在近代史上的偉大又增添一筆，之後越來越多湖南學生到日本遊學。章炳麟從王夫之的思想（《黃書》）中讀出反滿的因素，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並非由外國傳入，而是起源於王夫之的思想，王夫之作為明遺民表明了他對滿清不可折中的憎恨，而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雖然出版了王夫之的著作，卻沒有深刻洞悉其思想的真正內涵，站到了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維護滿清統治的一邊。章炳麟的思想影響了一批留學日本的中國非湖南籍學生，他們跟隨章炳麟，認為王夫之是中國的財產，他的著述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淵源。而湖南籍學生卻將王夫之看作湖南人的財產，是湖南民族主義之父，也是獨立和堅

決抵抗之區域獨特性格的象徵。《遊學譯編》雜誌作為東京湖南學生的組織和喉舌，集中了以楊毓麟、楊度和黃興為代表的各種不同背景的湖南留學生，他們開始追溯自鄧顯鶴到郭嵩燾再到譚嗣同等先輩對王夫之精神的提倡，認為王夫之具有兩種意義上的典範，一是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一是湖南現代性的起源。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梳理湖南從屈原到王夫之的地方愛國主義傳統，楊毓麟在《新湖南》中論述湖南現代意義上的獨立精神，無不首先強調湖南具有獨特的種族氣質和對中國的歷史責任，湖南的獨立和現代化是首要的任務，中國作為一個整體被置於湖南之後。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討論湖南人與辛亥革命之關係，以及王夫之之封聖。作者首先從辛亥革命前期組織準備，湖南人楊度、黃興、宋教仁在興中會等革命聯盟中發揮的關鍵領導作用談起，引出湖南人是否要犧牲本省獨立的資源來支持孫中山的全國性革命的問題。陳天華成為討論這一問題的中心，這一時期他從湖南地方自治的擁護者轉變到泛中國革命的另一極端，認為地方主義的迷信削弱了漢族的團結。然而他的兩封自殺遺言，一方面勸誡全中國人民應形成無種族區別的全國基礎的愛國精神，另一方面也要求保存湖南省學生組織，由此可見當時湖南知識份子在這問題上的矛盾思想。隨着泛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省的情感卻沒有消失，《洞庭波》的出版暗示了湖南省民族主義至少與全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樣高漲。而王夫之最終被清政府封聖，是讓當時的知識份子如章炳麟覺得震驚而迷惑的事情。楊毓麟的自殺成為辛亥革命時期的尾聲，楊在反清事業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革命形象和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守舊態度的矛盾，是當時很多革命者和知識份子共有的心理矛盾，作者認為他雖然擁有革命的思想 and 筆杆子，卻仍然有一顆改良的心。

辛亥革命後，清王朝被推翻，王夫之作為全國性反滿象徵的符號意義逐漸消失，轉而再一次成為湖南人的財產。在第一次湖南人治湖南的政治環境下，譚延闓政府民政司長劉人熙（引導譚嗣同讀王夫之著作的老師之一）決定以王夫之為中心，為革命後的湖南重建一套新的道德基礎。在袁世凱政府的資助下，劉人熙在郭嵩燾創建的思賢講舍舊址建立了船山學社，支持和出版王夫之的論著，並開展關於王夫之哲學思想與經世思想的講演活動。袁世凱企圖稱帝的政治局勢下，籌備登基的籌安會的主要人物中有一半是湖南人，其中《湖南少年歌》的作者楊度是籌安會的領導者，此時劉人熙對王夫之「獨立」思想和楊毓麟《新湖南》進行宣揚，在《大公報》上再次追溯現代湖南的緣起，楚國與屈原的符號、王夫之的象徵以及19世紀中葉以來的「湖南黃金歲月」又回到了敘事中心，再一次掀起建立獨立湖南、湖南人治

湖南的思想浪潮，重新喚醒湖南人的民族意識。然而楊昌濟與王闓運同樣不相信船山學社的民族主義，他認為王夫之狹隘的民族主義已不適合當時提倡「五族一家」的形勢，而應代之以國家主義。劉人熙與楊昌濟從不同的角度共同梳理了湖南人——從19世紀60年代曾國藩到70、80年代郭嵩燾，再到90年代譚嗣同和新世紀的湖南民族主義者——對王夫之的闡釋的歷史線索。

第七章中，作者主要討論毛澤東早年思想與湖南自治運動之關係，以及王夫之符號的消失。毛澤東在楊昌濟的湖南傳統教育之下，對屈原、王夫之、曾國藩等湖南文化的象徵人物非常欽佩。在張敬堯軍事政府統治時期，毛澤東與彭璜等發起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並出版刊物《湘江評論》。在全國性的五四運動中，湖南的激進主義份子在反帝的旗號下實踐對湖南自治的追求，湖南獨立的想法和實踐再次在新一代知識份子中興起，並且變得比以往更加激進。毛澤東的「湖南共和國」思想就是這一特殊局勢下的產物，也是近代以來湖南思想傳統的集中體現。到20世紀20年代，湖南歷史發展的方向在共產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發生了變化，毛澤東等人組成了湖南共產主義小組，並在船山學社基址創建了自修大學，王夫之的思想基礎被馬克思和列寧取代。至此，王夫之思想的時代告一段落。

湖南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除沿海貿易口岸和首都之外的另一個文化重心，在對其近代思想史脈絡的清晰梳理之後，作者尋得一種對中國近代史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敘述和認識。作者認為近代湖南人共同的思想淵源主要是王夫之，一代代的湖南人從王夫之的思想中尋求可以解釋和解決自身問題的因素，在不斷的地方史教育和現實政治環境影響下，湖南人對於「省」的意識逐漸形成，並發展成為一省自治和獨立的思想傳統，然而這種局限於省的民族意識卻並未與泛中國的愛國主義相衝突，而是在不同時期表現為不同的主次關係，一般來說，地方性的愛國精神（*provincial patriots*）被湖南人擺在第一位，但在全國性革命時期，這種精神融合於對整個中國的愛國主義之中，並甘願為中國革命犧牲地方主義的情感。

本書研究視角相當新穎，對所涉及人物之間的關係、他們的閱讀和著述考察得比較清晰。由於地方愛國主義與泛中國的愛國主義兩條思想脈絡的相互重疊，以往關於中國近代地方自治和民族主義的研究大多只看到泛中國意義上的愛國主義對中國改良者和革命者的影響，往往將他們的革命行動簡單地看成愛國思想的表現，未曾辨別其受地方主義影響的可能性及程度，本書的主要貢獻在於揭示了被泛愛國主義掩蓋的地方主義情感對近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影響，以及毛澤東一代及其先輩湖南人受地方思想文化影響的傳統。

然而縱觀全書，讀者不禁要問，本書所討論的湖南人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作者主要關心的是近代湖南省歷史影響較大、社會地位較高、受教育層次較高的群體，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具有一定的傳承關係和共同特徵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他們作為湖南人的代表，在塑造地方文化認同的過程中也會遭遇底層階層的反抗，這些對作者來說是很難解釋的，在全文敘述中將湖南人看作一個沒有意識形態分歧的整體，這在筆者看來，還有可以討論的空間。其次，湖南思想文化的傳統是否只有屈原、賈誼、王夫之？或者說，自曾國藩以下，作者討論的郭嵩燾、譚嗣同、楊毓麟、楊昌濟、毛澤東等人在思想上是否僅限於王夫之思想的影響？各個時期，在不同的需求下，知識份子對王夫之的解讀大有不同，並且後輩對前輩有一個反思的過程，這種解釋是不錯的，但也使討論受到限制，比如對楊度後期的活動缺少觀照，對梁啟超等「外省」人帶來的影響簡約化處理等等。第三，雖然作者討論了留日湖南學生的活動和思想，但仍然感覺局限於湖南內部，很難想象這些在日本的留學生只與本省人打交道，只受到本省文化的影響，並且在思想意識上完全統一。另外，僅從私人關係來解釋思想上的傳承似乎有點片面，每個人生活的大傳統和思想上受到的小觸動都可能影響其思想的發展，所以作者很難解釋楊毓麟既傳統又反傳統的心理狀態，而此特徵正是他們那一代人的集體特徵。

陳瑤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Jerry H. Bentley, Renate Bridenthal, Kären Wigen, eds. ,
*Seascapes: Maritime Histories, Littoral Cultures, and
 Transoceanic Exchang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x, 261 pp.**

本書的14篇論文源於在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召開的一次研討會，涵蓋海盜、航員、遷移、種族、造船、貿易等相關研究領域，涉及從16世紀的奧斯曼帝國與印度洋到20世紀早期西印度港口工人在巴拿馬運河務工的政治問題。本書的編者本特利（Jerry Bentley）為「全球史」和「海洋史」的研究先鋒，夏威夷大學教授、《世界史》雜誌的主編。其成名作 *Old World Encounters: 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 (New